



林天乙 / 著

中共党史论丛

岳麓书社



南强史学丛书

林天乙 / 著

Selected Papers on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中共党史论丛

岳麓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共党史论丛/林天乙著. —长沙:岳麓书社, 2004

ISBN 7—80665—514—X

I. 中... II. 林... III. 中国共产党—党史—文集

IV. D2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7964 号

中共党史论丛

作 者:林天乙

责任编辑:管巧灵

封面设计:黄 朝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0731—8885616(邮购)

邮编:410006

2005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625

字数:265 千字

印数:1—3,000

ISBN7—80665—514—X/G·439

定价:22.00 元

承印:长沙银都印务有限公司

地址:长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隆平高科技园志宏路

邮编:410126

电话:0731—4614158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

出版缘起

厦门大学历史学系已经走过 80 多年的风雨历程。她建立于 1921 年，是厦门大学最早设立的系科之一，长期以来为国家培养了数千名的本科毕业生，数百名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成为培养优秀人才的知名摇篮。经过几代学者的艰辛探索和薪火相传，我系形成了深厚的学术传统和显著的办学特色，现拥有专门史全国重点学科、国家历史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下设 6 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点、8 个硕士学位授予点），并与海外许多著名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比较稳固的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关系。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我系在教学与科研相长思想的指导下，继承发扬传统研究特色，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学科生长点，科研论著迭出纷呈，受到学术界、教育界同仁的瞩目与赞誉。

为了进一步推动我系的教学科研事业，更好地展示和交流有关成果，我们特推出这套丛书，以期与同志友好为繁荣 21 世纪中国历史学科而共同努力。

厦门大学历史学系

2003 年 8 月

目 录

一、中央苏区史论

- 闽粤赣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及其斗争情况…………… (3)
- 论红军攻打漳州的战略决策与战术指挥…………… (37)
- 关于赣南会议与宁都会议…………… (44)
- 中央苏区的反贪污浪费斗争评述…………… (68)
- 略论李德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84)
- 李德在中央苏区的错误…………… (101)

二、红一方面军长征史论

- 略论中央红军长征中的战略转变…………… (121)
- 浅谈红一方面军长征过贵州的军事战略问题…………… (135)
- 关于红一方面军长征中的几个问题…………… (148)

三、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史论

- 浅析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初期的战略转变…………… (161)
-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初期陈毅与项英的战略转变之争
…………… (169)
- 闽粤边区三年游击战争评述…………… (182)

四、毛泽东思想研究

抗战初期毛泽东同共产国际的分歧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	(193)
《走出困境的毛泽东》评介	(208)
五、华南抗日战争史论	
论国共两党在闽粤沿海的合作抗日	(217)
“南委事件”与华南共产党组织的应变措施	(228)
六、华南解放战争史论	
解放战争时期闽粤赣边区共产党组织和人民武装的 两次战略转变	(247)
战后中共闽西南白区组织在台湾活动始末	(259)
略论解放战争后期香港与解放区的通商贸易	(270)
浅析战后广东的粮荒	(280)
七、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述评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前后	(293)
张闻天庐山犯颜直谏	(325)
后记	(334)

一、中央苏区史论

闽粤赣边区革命 根据地的建立及其斗争情况*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创建的闽粤赣边区革命根据地是在闽西、东江（粤东）、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建立的基础上形成的，其范围包括闽西、粤东北和赣东南的一部分县、区。1930年10月被党中央划定为全国六大块苏维埃区域之一；接着，闽粤赣边区革命根据地内成立了统一的党、政、军、工、团的省一级领导机关，正式形成了闽粤赣苏区。在红军三次反“围剿”战争期间，闽粤赣苏区是中央苏区的后方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闽粤赣苏区进一步巩固发展，成为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拟就闽粤赣苏区的建立及其斗争情况、闽粤赣苏区同中央苏区关系的发展变化以及闽粤赣苏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问题作一概述。

一、闽粤赣边区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的发生发展

（一）闽粤赣边区各县的工农武装起义

地处江西、福建、广东三省边界的赣南、闽西、东江广大地区，都经受了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急风暴雨的战斗洗礼，都曾经有过广泛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组织，有过工人农民对地主豪绅阶级的许多经济、政治的斗争，大多数县都相继建立了共产党的县委、支部和特支组织。“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发生以后，闽粤赣边区的党组织和工农运动都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摧残，但各县的党组织基础依然存在。

1927年9月至10月间，周恩来、叶挺、贺龙、朱德等同志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在南下广东途中，先后转战于赣南、闽西、粤东各县，产生了深刻的革命影响。在党的“八七”会议确定的关于土地革命与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总方针的指引下，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推动下，赣南、闽西、东江地区的党组织遵照各自省委制定的武装起义计划，在各县分别组织发动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工农武装起义。

在赣南地区，从1927年冬至1928年春，先后爆发了赣县大埠起义，信丰起义，于都里仁、步前、桥头起义，寻邬起义等。参加起义的工农武装，先后组织成立了各地的工农革命军纵队和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建立了红军游击根据地。

在闽西地区，1928年春夏，先后爆发了龙岩后田起义，平和起义（平和县属闽南地区，同闽西的永定县和东江的大埔县、饶平县接壤），上杭蛟洋起义，永定金丰、湖雷、溪南起义并联合攻打永定县城。参加起义的工农武装，先后组织成立了福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和红军第七军第十九师第五十五、五十六、五十

七团。同年7月，闽西各县和平和县的党组织成立了统一的领导机关——中共闽西特委。接着又成立了永定溪南区苏维埃政府，并在溪南区实行分配土地，有近两万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

在东江地区，早在1927年4月即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成立了中共东江特委。从4月下旬至1928年2月，中共东江特委及下属组织先后组织领导了澄海起义，普宁起义，海丰、陆丰、惠阳、紫金（即海陆惠紫）起义，梅县“五·一二”起义，兴宁兴城起义，五华年关起义，龙川鹤市起义，大埔高陂起义和声势浩大的攻打惠来县城的战斗。在以上地区的工农武装起义中，先后建立了各地工农革命军的团一级组织，许多县、区还成立了短时间的苏维埃政权。从1927年秋冬至1928年春，由于敌强我弱，东江地区各县的工农革命武装先后向边界山区集结，并分别在大南山、西岩山、八乡山、九龙嶂、大塘肚、铜鼓嶂等山区建立游击根据地。1928年五六月间，根据东江特委的指示，成立了五、兴、梅、埔、丰“五县暴动委员会”，并于8月间组织发动了“畚坑暴动”。不久，揭阳、潮安两县党的负责人到八乡山九龙嶂与“五县暴委”领导人汇合，“五县暴委”扩大为“七县联委”，并接着组织发动了梅县、兴宁、五华、丰顺、大埔等县的秋收斗争和年关斗争。1929年4月，又爆发了丰顺起义。

赣南、闽西、东江各县的工农武装起义，揭开了闽粤赣边区“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的序幕，为尔后赣南、闽西、东江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闽粤赣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红四军进军闽粤赣边区与赣西南、闽西、东江革命根据地的开辟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先后向赣南、闽西进军，并一度进入赣粤、闽粤边境。在地方党组织和红军的密切配合下，红四军相继取得了大柏地、宁

都城、长岭寨、龙岩城、白砂等战斗的重大胜利，消灭了国民党地方土著军阀的有生力量，解放了闽赣边界重镇汀州和赣南、闽西的许多县城、区镇及乡村，广泛发动了地方群众的武装斗争。3月20日，毛泽东在闽西汀州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1]。

遵照红四军前委制定的战略计划，1929年4月至7月，红四军先后在赣南、闽西举行著名的“四月分兵”和“七月分兵”，进一步扫荡了地方反动势力，促进了各县红色政权的建立和土地革命的开展，同时帮助建立了地方红军和扩大了红四军主力部队，初步形成了以兴国、宁都、于都三县为中心的赣南革命根据地和以龙岩、永定、上杭三县为中心的闽西革命根据地。

1929年5月，中共赣南特委召开赣南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大会遵照红四军前委和毛泽东的指示，确定赣南党组织的任务是：充分发动群众，壮大党的力量，扩大地方武装，实行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大会选举产生了以肖韶为书记的新的赣南特委领导机构。同年7月，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中共闽西特委在上杭蛟洋召开闽西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苏维埃政权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等。大会提出闽西党组织的方针和任务是：坚决地领导群众，为实现闽西工农政权的割据而奋斗；巩固并扩大党组织；发动并组织广大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扩大工农武装。大会选举产生了以邓子恢为书记的新的闽西特委领导机关。

中共赣南“二大”和中共闽西“一大”的召开，将赣南、闽西的工农武装割据斗争进一步引向深入。到1929年11月底，闽西红色区域已扩大到龙岩、永定、上杭、武平、长汀、连城6县的纵横数百里之间。在这区域内，先后建立了4个县苏维埃政府

和 50 多个区、400 多个乡的苏维埃政府，近 80 万贫苦农民分到了土地；党的组织至 1930 年 5 月已拥有 6 个县委、53 个区委、19 个特支和 546 个支部，党员人数约 1 万人。赣南红色区域则从 1930 年春向赣西南地区发展，同以吉安东固、延福为中心的赣西红色区域连成一片，形成以赣南为中心区域的赣西南革命根据地。

1930 年 3 月间，闽西和赣西南相继召开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分别成立以邓子恢为主席的闽西苏维埃政府和以曾山为主席的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它们标志着闽西和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

在东江地区，1929 年 6 月，中共东江特委在丰顺县的黄礮召开东江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会议传达了中共“六大”精神和决议，讨论了政治、党务、组织、宣传、职工运动、农村工作、军事问题等。大会确定东江党组织目前的总路线是：“扩大党的政治宣传，加紧日常斗争的鼓动与指导，争取广大群众。”大会指出东江党目前的中心任务和策略是“团结、积聚革命力量，准备暴动的时期”，“游击战争必须积极的运用，农民自发的暴动，必须积极领导，武装必须尽可能的准备”^[2]。大会选举产生了以卢济为书记的新的东江特委领导机关。

在中共东江“二大”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在赣南、闽西工农武装割据斗争胜利的推动下，东江地区各县以及地域属赣南、党组织属东江特委领导的寻邬县的农民斗争逐渐由减租发展到没收分配地主的土地，推翻豪绅政权和建立苏维埃政府。党的组织也迅速发展，至 1929 年 8 月，在东江特委之下已建立了 14 个县委和 50 个区委、419 个支部，党员共 5000 多人。

1929 年 10 月至 11 月间，红四军奉命从闽西上杭经武平出击东江，进一步帮助和促进了东江地区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的深入开

展。是年秋冬，农民的秋收斗争和年关斗争遍及整个东江地区，打土豪、分田地到处都在进行，各级革命委员会和苏维埃政府纷纷建立。到 1930 年 3 月间，东江特委所管辖的 16 个县中，已有县革命委员会 8 个（即寻邬、龙川、梅县、兴宁、五华、丰顺、大埔、潮安），县苏维埃 1 个（即惠来），区苏维埃 20 个，区革命委员会 10 多个，乡苏维埃 278 个，人口约 30 万，迅速形成了以八乡山为中心的东江革命根据地。5 月 1 日，东江苏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八乡山召开，成立了以陈魁亚为主席的东江苏维埃政府，它标志着东江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形成。

1930 年春夏，在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精神的指导下，闽粤赣边区党组织和红军的思想、组织建设又取得了新的成绩。边区的地方红军经过整编和扩充，相继建立了政治、军事素质都比较好的军一级红军部队。其中赣西南苏区先后建立了红六军、红二十军、红二十二军；闽西苏区先后建立了红十二军、红二十军；东江苏区建立了红十一军。此外，各苏区还普遍建立了工农赤卫军、赤卫团、赤卫队、少先队等群众性的武装。

闽粤赣边区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的发生发展，赣西南、闽西、东江革命根据地的形成，为闽粤赣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党中央和红四军前委，正是在这三块革命根据地逐渐形成和巩固发展的过程中，进一步提出建立大规模的、连成一片的闽粤赣边区革命根据地的战略计划的。

（三）闽粤赣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基本形成与土地革命的深入

在赣南、闽西、东江革命根据地初创和巩固发展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和红四军前委即已把打通三块革命根据地，使之连成一片，作为党与红军的战略行动计划来执行，并于 1930 年 6 月基本实现了这一计划。

1929年6月中旬,在赣南、闽西革命局面初定与联系沟通的形势下,红四军前委派陈毅赴东江,“向东委(东江特委)商量红(四)军来东江工作问题”^[3]。同年7月,在毛泽东直接指导下召开的中共闽西“一大”上,专门讨论了打通闽西、东江、赣南、湘赣边苏区的联系问题,并确定了以下的计划和步骤:“加紧长汀、武平工作,注意瑞金、会昌、寻邬、平远、蕉岭工作,特别是闽粤赣三省枢纽的长汀要加紧工作;建立闽西、赣南、东江、湘赣边界四个区域的最高党部,指挥四区域的工作,造成四省边界的赤色政权;应与东江、赣南两地党部发生秘密关系。”^[4]

1929年9月,第二次两广军阀战争爆发,给红军打通闽西、东江苏区的联系造成了有利条件。因此,中共中央通知福建省委指示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朱毛红军(红四军)全部立即开到东江去……要扩大我们的工作到东江来,与闽西相呼应,取得很好的联络,使闽西、东江连成一片”;“四军开往东江的路线,是应当加紧向梅县、大埔、丰顺、兴宁、五华前进,与海陆丰联络起来。”^[5]9月28日,中共中央又在著名的《九月来信》(即《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对红四军如何利用两广军阀战争,开创闽粤赣边区工农武装割据新局面的军事行动问题进一步作了具体的部署,并强调指出:“在全国革命高潮未来时,红军此时主要地采取粤、湘、赣、闽四省边界游击的策略是对的,但要注意使这四个区域的赤色势力联系起来。”^[6]

1929年10月中旬至11月下旬,红四军遵照中央的指示,先是从闽西的上杭经武平出击东江,转战于梅、埔、蕉、丰、平5县。继而折入赣南的寻邬、安远,而后回师闽西,进占汀州,进一步沟通和密切了闽粤赣边区红色区域的联系。与此同时,东江特委和闽西特委也积极从组织上、军事上、政治上和后勤保障工

作上配合红四军进军东江的军事行动：东江特委命令驻大南山的红四十七团立即开赴西北，协同红四十六团占领汤坑、隘隍，以截击从潮汕方面赴援西北之敌；闽西特委则大力“加强上杭南路和武平工作，统一汀河（江）两岸的赤色区域，使之与赣南、东江的革命势力取得联系”^[7]。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上杭古田针对林彪的右倾悲观思想给他写了复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批评了那种不愿做艰苦工作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错误倾向，同时也批评了林彪没有在闽粤赣边区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红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从而进一步强调创建闽粤赣边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毛泽东在复信中深刻指出只有中国工农红军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才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毛泽东在这封信中进一步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开始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这一理论又及时地指导了当时闽粤赣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工作。

1930年1月，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红四军从闽西转战赣西南，胜利地打破了闽粤赣敌军发动的第三次“三省会剿”。2月6日至9日，在毛泽东、刘士奇、曾山的组织领导下，红四军前委和红五军、红六军军委及赣西、赣南特委，在吉安县陂头召开联席会议（即“二七”会议），听取了毛泽东关于政治形势和今后任务的详细报告。会议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成立既领导赣西南、闽西、东江苏区，又指挥红军第四、五、六军的“前委”，其委员由红四、五、六军和赣西南、闽西、东江等苏区的主要党政军领导人组成，毛泽东为前委书记。前委成为当时闽粤赣边区各苏区的党政军最高领导机关，直属中共中央领导。此外，会议

还决定将中共赣南、赣西特委合并，成立以刘士奇为书记的中共赣西南特委。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领导机关的成立，不但加强了闽粤赣边区党和红军的斗争联系及统一领导，而且为尔后闽粤赣边区大规模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形成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

“二七”会议后，红四军和红六军一部协同作战，于2月24日、26日在吉安县水南、施家边全歼国民党独立第十五旅唐云山部近3000人，极大地震动了闽粤赣三省敌人。随后，红四、五、六军又进行了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和贯通闽粤赣边苏区的大规模分兵游击活动。

1930年3月中旬，毛泽东在赣州城郊楼梯岭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并于3月18日发布了《前委通告第三号——分兵争取群众的意义及工作路线》。《通告》客观分析了当时闽粤赣三省的敌我形势，认为赣南、闽西敌人力量空虚，是红军分兵游击和深入发动群众的极好机会，因而决定红四、五、六军部队以三个月为期，实行分路游击，以完成打通和连贯闽粤赣三省各红色区域的战略任务。为了达到分兵的战略目的，《通告》要求红军分兵各地时，要采取“同时扩大同时深入”的方针，有计划地帮助原有红色区域的党及群众去组织政权，建设武装，分配土地，加强党与团体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将原有区域扩大到全县，并推广到邻县。同时要求红军分兵期间必须遵循“波浪式的向前扩大”的工作路线，地方党的行动要与红军的行动合拍，以切实完成连接闽粤赣边区红色区域的战略计划。

1930年3月下旬至5月下旬，红四军所属各纵队和红六军第二纵队等部队，遵照《前委通告第三号》确定的分兵计划及其方针政策，根据前委的具体分兵游击部署，先后实行战略展开，在赣南和粤东北地区各县开展大规模的分兵游击活动。3月19日，红四军第三纵队从赣州城郊出发，向于都开拔，首先以于都县为